第一章　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和萌芽

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是一门研究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萌芽、发展到成形的历史进程及其所蕴涵的内在客观规律的学问。它必须以历史事实（文献记载和文物考证）为依据，并且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合理的推理，从而力求对中国古代报刊的历史、尤其是早期中国古代报刊发展的历史，勾勒出一个大体准确可信的轮廓，并且能从中获得某些规律性的启示，以供后来报刊研究参考。要研究中国古代报刊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律，首要前提是要能科学地确定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即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的历史起点，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的基本问题。

确切地说，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报刊发展历程相仿，中国古代的报和刊，倘若按照现时的标准，其界限似乎是模糊不清的，既无所谓报，也无所谓刊。本书既为叙述的方便，也为了和前已出版的拙作《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在题名上相衔接，故以“报刊”合称之。

第一节　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的研究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1]这已经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但究竟在什么时间（历史时期或朝代）出现了中国古代报刊的初始性萌芽，也就是说把中国古代报刊的历史起源确定在哪一个历史时期或朝代，海内外学术界人士的看法却不很一致，有些认识甚至相距很大，而且似乎是各有依据和理由。归纳起来，对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周朝说”

该种观点认定中国在周朝时期即出现了古代报刊的萌芽，中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代报刊起源的时间点应定在周朝，距今约近 3000 年。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主要是外国学者，有日本人，也有美国人，还有法国人。近代报界巨子梁启超及秦理斋等人，也持有大致相近的观点。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前后，日本新闻史研究者后藤武男在其所著的《新闻纸研究》一书中提出：“原始新闻纸的发行，中国比罗马还早，就是比着于西历纪元前 60 年顷罗马所发行的两纸还早。较此早 900 余年前的同时，已经有所谓‘京报’这种新闻纸刊行”。[2]据文献记载，公元前 60 年，凯撒大帝在罗马执政后，他的第一个法令便是每天编辑出版（公布）元老院和平民会议的记录。这就是被国外学术界称为西方最早报纸的《每日纪闻》(Acta Diurna)。它曾用过多个名称，如 Acta Senatus、Acta Populi、Acta Popula 及 Acta Diurna Populi Romani 等，其内容涉及政治事务、皇家新闻、公众关心的重要新闻等方面。具体做法是把这些内容书写在涂有石膏的白色书板上，陈列于公共场所，以供居民观看了解，同时还雇佣许多抄写者把内容抄写成副本，各处张贴。[3]并且还把写有新闻内容的涂有石膏的白色书板，通过驿道传送到各省，从而扩大对上述新闻内容的传播范围。后藤武男之所以称“罗马所发行的两纸”，可能是源于《每日纪闻》的内容主要是来自于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会议和平民会议；也可能是当时的《每日纪闻》，用略有不同的名称来分别发布元老院会议和平民会议产生的新闻，即同一名称的不同内容版别。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与后藤武男同时的日本新闻研究者杉村广太郎在其所著的《新闻概论》一书中认为：“‘京报’是官报的一类，从周朝就有，一直继续到清朝的灭亡。若是始自周代，则至今约三千年了，无论怎样，可以说是最古的新闻纸了”。[4]

另外，据我国著名的新闻事业史研究者胡道静先生在其《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一书中介绍，曾经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前身）新闻系任教多年的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教授（其英文名字为 Roswell Sessoms Britton）也持有与两位日本新闻史研究者相近的观点。他把一种据说在周朝就已经出现的报纸称为“公报”，并且进一步认为这种

被称为“公报”的报纸创办于公元前 620 年，即周襄王三十二年。[5]照此推算，中国古代报刊出现萌芽至今已有 2620 年的历史了。不知是否有可靠的事实依据。

二、“汉朝说”

这种观点认为在中国汉朝时期，中国古代报刊的萌芽就已经出现。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国学者戈公振先生。同时他也是在学术界第一个提出“中国古代报刊产生于汉朝”观点的学者。

戈公振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中国报刊历史的《中国报学史》中，从《说文》一书对“邸”字的解释，《汉书》对“邸”这一事物的“注”，《史记·封禅书》中对“邸”的记载以及《西汉会要》对“邸”这一机构的性质、功能的说明等方面，率先提出“汉代即有邸报”的结论。尽管该书第二章（官报独占时期）第二节的标题仍为“汉有‘邸报’乎”，但从行文的内容上看，结论却是肯定的。他认为“邸”“属国舍也”。“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由此进一步指出：“邸之制度，由来旧矣。邸中传抄一切诏令章奏以报于诸侯，谓之‘邸报’，犹今日传达消息之各省驻京代表办事处也”。他根据《西汉会要》中“大鸿胪属官有郡邸长丞”的记载以及对“邸”这一机构性质所作的“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的注疏，明确指出：“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起也”。[6]《中国报学史》写成于 1926 年 6 月，出版于 1927 年 11 月。尔后，他又在《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一文中明确指出：“汉唐当藩镇制度盛行时，其驻在京师之属官，皆有‘邸报’之发行”。该文载 1927 年《国闻周报》4 卷 5 期。到了 1930 年，他又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指出：“汉因幅员广大之故，不得不刊行一种传布朝廷大事要政之官报。同时驻京各地诸侯，亦设邸府京师，沟通朝廷消息，遂生邸报”。[7]

在戈公振先生提出“汉朝说”之后，黄天鹏的《中国新闻事业》、吴晓芝的《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以及管翼贤的《新闻学集成》等著作

中，都采纳了戈公振先生的观点，而储玉坤在其所著的《现代新闻学概论》中，则进一步明确认为“我国自汉唐以来，即有邸报”，[8]上述著作出版的时间已在本世纪40年代末。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著名的新闻史研究学者曾虚白在其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一书中，仍然采用了戈公振先生的“汉朝说”观点，认为“因为武帝之武功鼎盛，工商繁荣，文化发达，各藩王与汉武帝之间关系密切，对于京师的政治情报，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报自然应运而生”。[9]

三、“东晋说”

该种观点认为在中国东晋时期，中国古代报刊就已经出现。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一位姓氏不详的外国学者。

1982年5月，由人民日报社创刊的《新闻业务》月刊改名而来的《新闻战线》，在1982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范先聿翻译、但没有署原文作者姓氏的文章《传播技术的演变》，文章认为：“公元363年，在中国开始出现邸报，这是历史上最悠久的杂志，一直延续到近代。”该篇文章的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民主新闻工作者》上。这一观点明确无误地把中国开始出现“邸报”的时间，确定在公元363年，即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同时，把“邸报”又首次说成“杂志”，即把古代“报纸”和“杂志”的概念合一，似乎是一大进步。但因文中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仅仅作出这一结论，所以无法证验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只得有待于出现有关史料来验证了。

四、“唐朝说”

该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报刊产生于唐朝。在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方汉奇先生。

1981年6月，他在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第一章《中国早期的报纸》中率先明确提出：“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邸报大约起始于唐朝，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因为由‘邸吏’负责传发，所以称为‘邸报’”，“邸报的内容主要是：一、皇帝的诏书、命令和皇帝的起居言行；二、封建王朝的法令、公报；三、王室的动态；四、关于封建政府

官员的升黜、任免、赏罚、褒奖、贬斥等方面的消息；五、各级臣僚的章奏疏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机关给皇帝的工作报告、各地驻军将领的战报、封建言官对朝廷措施的规谏、对失职官吏的弹劾等）和皇帝的批语，没有一般的新闻和言论”；“邸报只在封建统治机构内部发行，它的读者以分封各地的皇族和各级政府官吏为主，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地方上的豪绅钜贾往往也可以设法看到它的抄件，一般的庶民百姓是看不到邸报的”。[10]在这里，方汉奇先生对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作了明确的叙述，包括它的名称、名称来源、起始时间、性质、内容、传播范围和传播的对象等方面，是国内学者对“邸报”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尔后他又在与陈业劭、张之华等人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再次肯定了这一观点。

到 1992 年 9 月，由方汉奇先生任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出版。在由他亲自执笔著作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中，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中国早期的报纸，始见于唐代”；“出现于唐代的最早的报纸，是地方诸道和各藩镇派驻朝廷的邸吏，向地方传发的一种报状”；“这种报状是邸吏们根据朝廷‘条布于外’或‘牒布于外’的文件和信息，以及自己采集到的各种情报，先于正式公文，传发于地方的”；“它们是封建地方军政官员获取朝廷信息的重要新闻传播媒介。它们的发报活动，受地方当局的指挥，因而归属于地方，不具有封建中央政府官报的性质”；“由诸道邸吏向地方传发的时事报状，其起始时间，大约不晚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即公元 8 世纪初”；“唐代的报状，是一种从官文书游离出来的原始状态的报纸。……这种报状虽然还残留有某些官文书的痕迹，但已不同于官文书，反映了由官文书向早期官报转化的历史轨迹。从某种意义来说，它十分接近于 16 世纪诞生于欧洲的‘新闻信’。和后者一样，都是现代报纸的原始状态，但早于后者约 800 年”；邸报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宋朝。这是古代人对封建官报最经常、最习惯使用的一种称呼”。[11]

和方汉奇先生持有相同或相近观点的新闻史研究著作，据笔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所见主要有：

我国台湾的新闻史研究学者朱传誉先生所著的《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他在其中的《唐代报纸研究》一文中认为：〔(唐)裴庭裕所撰《东观奏记》和（唐）锺辂所撰《前定録》〕“这两篇文字中所提到的‘报状’一词，显然是报道马植升官的事，自然可当作邸报看待。当时邸报的内容主要是官吏的任免，如《旧唐书·唐本纪》记唐明宗（后唐）长兴三年，史馆奏：‘宣宗以下四庙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购募野史及除目报状。从之。’除目就是官吏的任命，‘除目报状’和前述‘报状’同义。”并且认为“唐代的进奏院，不但是最早的报馆，还是最早的钱庄。”〔12〕

黄卓明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认为：“《李师古传》提到的‘得邸吏状’,《全唐诗话》提到的‘客曰邸报’,《东观奏记》提到的‘报状至蜀’，显然都指的是‘进奏院报状’。因为它是由进奏院抄传的，进奏院曾被称作‘邸’，所以在有的记载中使用‘邸吏状’或‘邸报’，而不像收入《桂苑笔耕集》的表状那样写明‘臣得进奏院状报’。看起来名称似不一致，实际上则属于同一事物，这应是明确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而且很可能是在‘盛唐’的历史条件下，创始于开元年间。又基于开元以后藩镇制度盛行的历史条件，形成为第一级的‘报状’和第二级的‘进奏院状报’。两者的内容一致，这是唐代报纸的一个特点。”〔13〕

由十四所高等院校合编、王洪祥任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认为：“‘贞观之治’之后，唐玄宗任用贤相，整顿弊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人口增加，经济繁荣，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就在这‘开元盛世，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手写报纸——报状”；“唐代又一重要的新闻传播媒介进奏院状。唐朝的进奏院是在汉朝的‘邸’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进奏官可以向中央政府查询一些行政事务，参与朝廷的盛典活动和将京师消息通报给所属地区的行政长官。……这便出现了进奏官根据报状抄写的‘进奏院状’”,“如果说‘报状’是唐代的一级传播媒介，‘进奏院状’为二级传播媒介，那么，

观察使牒（报）就属第三级传播媒介。唐代把全国划分为十道，道的最高军政长官是节度使，在他得到皇帝诏令或进奏官的状报后，往往通过其副职观察使，向下属官员发出牒报”。[14]

除了上述介绍的著作外，还有诸如尹韵公所著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以及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等，也都大抵是持“唐朝说”观点。

上面我们初步回瞻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报刊起源时间的不同观点，由于笔者所见文献有限，可能还有一些观点未能列出，只好待以后来补充，或请学术界同人方家指正了。

第二节　中国古代报刊起源“战国说”

前面我们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研究上的不同观点和各自的论据，应该说都有其相对合理的部分，否则，作为一个对新闻史有一定研究和思考的学者，绝不会凭空猜测或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种观点。其不能引人信服的原因，主要是缺少确凿可信的实物和文献佐证。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刊“起源”含义的基本认识

中国古代的报刊到底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很难一时有确凿可信结论的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 是对“起源”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差异。

“起源”只是开始出现，甚至只是有一点点萌芽，有一点后来发展成事实的迹象，而不是后来已经发生的事实。《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上对“起源”一词的解释是：(1)开始发生：秦腔〔起源〕于陕西说，(2)事物发生的根源：生命的〔起源〕。[15]这就是说，“起源”一词的本义是“开始发生”、“事物发生的根源”，即指事物刚刚出现时的一种现象；是事物发生到形成的起点，而不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结果。从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到中国古代报刊的“形成”应当说在表现形式上有较大的差异。所谓“形成”，是指“通过发展变化而成为具有某种

特点的事物，或者出现某种情形或局面”。[16]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事物达到“形成”的发展水平，一定要“成为具有某种特点的事物”或“出现某种情形或局面”，受到社会较一致的认可。从“起源”到“形成”再到“成熟”，这是一般事物发展的三个阶段，而“成熟”则必须达到‘(1)植物的果实等完全长成，泛指生物体发育到完备的阶段。 (2)发展到完善的程度”[17]。由此可见‘成熟’的状态水平和‘起源’的状态水平有更为悬殊的差距。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把“起源”、“形成”和“成熟”的状态水平引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为科学、客观地确定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提供一个较为实际的理论范式。“起源”就是“刚刚开始”，“事物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也不应要求中国古代报刊在“起源”阶段就达到明显地表现为“具有某种特点的事物”，或“出现某种情形或局面”的“形成”阶段的状态水平。我们都公认长江起源于唐古拉山的某一山泉涌出之处，但假如到实地一看，那只是一股绢绢细流而已。在这股细流边上，丝毫感受不到浩浩长江的风范和影子。但世人仍然不否认长江起源于斯的结论。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点，应该定在它刚刚出现萌芽的那个时间点上，而不能定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某种特点事物”的后来的某一时间点。

2．是对中国古代报刊起源时的“形态”理解上有较大的差异。

所谓“形态”，是指事物的形状或表现；生物体外部的形状。相当多的新闻史研究学者认定中国古代报刊起源于唐代，甚至认定是在唐朝“开元盛世”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手写报纸——“报状”。毫无疑问，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我们认为这“报状”已经是在从“起源”以后，发展了较长时间到达“形成”状态水平的结果，而不是“起源”时的水平。这是指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历程中内容“形态”上的发展演进。

“形态”的更重要的方面是指中国古代报刊的外观。究竟中国古代报刊在“起源”时应当具有什么样子，即达到什么水平的“外观形态”，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作过系统的思考和探讨。应当明确，

中国古代报刊的“外观形态”是随着人类自身的完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进化的。在纸张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古代报刊不可能出现以纸张为新闻信息载体的物质外观形态，这是丝毫不能怀疑的。但在纸张产生之前，我们的先人是否曾经利用过其他物质材料，作为记录传播新闻信息的媒介呢？假如用了其他材料，记录有新闻信息并且传播给别人。这记录有新闻信息的“其他”材料，即新闻信息荷载于其他物质材料如木牍、竹简等形成的用于传播新闻信息的物体，能否看成是中国古代报刊的萌芽呢？产生这一萌芽的时间点能否确定为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点呢？我们的观点是肯定的。因为假如硬要认定只有产生纸质材料的中国古代报刊才能作为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那么，剩下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古代报刊问题，而且还可延伸到对现在“网上报刊”的认定，即仅出版网络版、不出版纸质版的报刊算不算报刊。因为光盘、网络和竹简、木牍一样，都不是以纸张为载体，而且光盘和网络版报刊，甚至信息存贮形式都不是文字形式了。

二、关于中国古代报刊起源于“战国”之我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昭示我们，对世界万事万物，应当采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去认识和研究。正如方汉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报纸或称新闻纸，是一种以报道新闻揭载评论为主，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严格地说来，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但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这种完全意义的报纸，也并不是突然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经历了一定的过程，逐步地孕育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这一过程十分悠久而漫长。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的萌芽；早在中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的雏形。尽管和现代的报纸相比，它们还比较原始，不够完善，但毕竟反映了中国报纸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该认真地加以考查的”。[18]

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的认定上，只要具备以下几个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的条件，就可以认定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首先是有以传播新闻为主旨的社会成员和社会活动；其次是有荷载并用于传播新闻的较为固定的物质材料及形态；再则是新闻的收集和传播活动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新闻收集、整理、荷载、发布〔传播〕的社会运作体制。只要具备了上述几个条件，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纸质形态的报纸，可能是把新闻消息刻在木牍、竹简或其他材料上；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如今报刊的基本形态要素（如稳定、统一的题名、版式等），甚至尽管当时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借助报刊传播新闻消息的意识——但客观上已具备了新闻传播的功能和影响，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报刊已经开始“起源”了呢？我们认为结论应当是肯定的。

根据以上分析和认识，我们在学习、研究、分析了所能见到的一些前人在文献中的记载和论述以后，似乎可以认为，说中国古代报刊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即《春秋》是我国古代报刊的最早萌芽，或初始性的萌芽，似乎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主要理由如下：

1.《春秋》之名似乎与游学文人或官府派遣的文官所进行的民间采风记事活动有关，而这些采风记事活动则与后来的报纸记者采访活动有类似的性质

东汉人许慎所撰的《说文解字》一书中，有“”一字（读音与“记”相同）。对该字的意义，我国报刊史研究的开创者戈公振先生认为：“”从“丌”，其义为荐陈，犹今言报也；“”从“”，其义为行走，犹今言访也。故“”与“后世记者之职为近”。并且进一步认为，“”之所采为《诗(经)》；“”之所记亦即为《春秋》。[19]那么，对“”所记的内容为什么不是以“冬夏”“东西”甚至“南北”或其他事物、节令来命名，而偏偏要以“春秋”来命名呢？据《左传》一书中所引用的《夏书》中的记载，“遒〔笔者注：即“”，〕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这段记载的内容大致是：游学文人或受官府委派到乡间采风问俗的人们，敲着木铎〔以告诉乡人，采风问俗之文官的到来〕，沿着大路到四乡采风。地方官员或

官学师傅相互提醒，以使自己的言行合乎规范，以免被采风问俗的人们抓住违规的事迹而记录下去；那些从事工艺或体力劳动的人们，见到采风问俗的文官则向他们诉说自己心中的不平。到了正月结束后的孟春时节，采风问俗的文官们就在官府或官学，对采集到的民风民俗材料进行整理，于是就产生了与之相关的文字记录。这是“春”字的来历。另据刘歆在写给杨雄的信中称：“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衆代语重谣歌戏。”这是说在三代周秦时期，在每年的八月中秋前后，官府就派一些乘车的文官或步行的文官（逌），沿着国道出巡，其目的就是征集民间产生并流传的谚语或歌谣。

从上述两段文献记录中，我们大体可以推知，每逢春秋两季，官府所派出或自己四处周游的“逌”（訄），即采风问俗的官员或游学文人就到民间去采风。当一季的采风活动结束（即春季采风结束后进入夏季，或秋季采风活动结束后进入冬季），采风官们就把在春秋两季间采写到的民间诗歌、谚语或收集到的关于各封国的政治、社会、军事及民间习俗杂闻，整理记录成文。因其得之于“春”“秋”两季，故命名为《春秋》。采风问俗的目的之一就是搜集民风。而当时的采风问俗活动，与后来的记者采访活动确有相似之处。台湾学者朱传誉先生认为：“风就是民谣。不过，民间不合乐，只能说是徒歌。经采集以后，为了便于合乐，在文字或形式上，可能经过润饰、修改，和原来的面目稍有不同。所谓‘讴’、‘诵’，只能说是有韵的语言，更近于‘新闻’或‘消息’。我们可以说，谣的原始形式是‘新闻，’‘简其语，齐其句，谐其音’，是为了便于传播”。[20]而我国近代著名报人梁启超则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即有报馆一类的机构，采风官们的文字记录就好像后世的《民报》。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说：“报馆于古有微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21]由此可见，《春秋》的产生与当时人们在春秋两季进行的采风活动是直接相关的。而这种有目的的采风活动与后来的记者采访活动似乎又有着某种共同之处，甚至可以说有某种渊源关系。

2.《春秋》之谓早先并非是一种史籍的专有名称，而是一个文献类型——以记录和传播新闻为主要目的形成的文献类型的通称或共用名称

《春秋》之名对于今人而言，大多专指由中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丘（字仲尼）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儒家经典之一，即鲁国的编年史《春秋》。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专名，即《春秋》即鲁史，鲁史也即《春秋》。然而，在春秋战国前后的一个阶段中，《春秋》一称并非是鲁国国史的专有名称，因为同时期中存在的其他诸侯国家的史书，也有称之为“春秋”的。据《墨子·明鬼篇》记载：“杜伯之鬼，射杀周宣王，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在子仪之鬼，荷朱杖击燕简公，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祩子橐 𥘅观辜，殪之坛上，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羊触中里徼，殪之盟所，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据说墨子曾见到过百国春秋，以上不过是举了几种为例而已。由中国留日学生陈家鼎、景定成、仇式匡主编的 1907 年 1 月 25 日创刊于日本东京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刊物《汉帜》，在清政府公布巡警部制定的《报章应守规则》九条后，曾发表《满政府之取缔报馆》一文予以抨击。其中说：“……中国古无所谓书与报之别，今日之报，即昔日之书也。考孔子以匹夫修春秋，附于古者右史纪事之列。周秦诸子，各以百家杂鸣，是春秋与百家诸书，即古者之新闻杂志也”。戈公振先生在其《中国报学史》中认为：“凡此所谓《春秋》，均与后世报纸之性质为近。”朱传誉先生也认为：“古代的春秋或者历史记事，倒很类似今天的报纸”。[22]

从众多诸侯国的史书都以“春秋”之名相称，而众多的“春秋”又不约而同地以记载当时发生的且有传播价值或史实价值的社会新闻或历史事实为主；联想到康有为等人首办报刊杂志时曾取用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创办的《万国公报》杂志相同的名称；再联想到北京早期编印的民营报纸一律以《京报》之名称之等现象，说《春秋》一名为当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新闻、民间杂说及各诸侯国情况（大

事）记录的通称，或为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新闻的汇编，似乎也不无一点道理。经过汇编整理后的“春秋”是“新闻”的汇编。那么，没有经过孔子整理修订的“春秋”初稿，当然就具有某种记载、传播社会政治、社会新闻的功能了，说它是古代报纸的萌芽似乎也不无一点道理。

3.《春秋》一书的内容，在当时就具有鲜明的新闻特征和价值

所谓“新闻”，一般认为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23]《春秋》一书所记录的内容，诸如宫廷佚事、王室倾轧、兄弟争王、诸侯结盟、两国交战、外交争端、君臣治国以及自然灾害等等，都是当时的诸侯、君臣及国人们关心的热点事情，也都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时效性、社会性和倾向性。这些内容又毫无疑问成为王室及诸侯政府机构对臣僚、部将、国民或盟国发布消息的主要内容。假如当时已经出现诸如后世“邸报”、“朝报”之类的信息传播媒体，那么这些内容当然也就是它们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价值的新闻的积淀就成为重要的历史素材。徐中舒先生认为：“《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前后 240 余年，都是战国时代的人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近现代史”。[24]所记录的内容，实际上是鲁国 240 余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大事记。这些内容，当时又是或多或少、或早或迟、或广或窄地向诸侯、官吏甚至国人通报的。凡是抄报于外即向人们通报的，其内容即具有新闻的特征，其形态也可以说具有朝报或邸报的特征，甚至可以看作朝报或邸报的前身。也许正因为如此，徐中舒先生才进一步认为：“《春秋》原是朝报邸报一类的原始记录”。[25]当然，因为当时政治的需要或条件所限，对上述内容只能择其要者而报之，大量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原始记录只能作为文书档案保存在宫廷中，成为后人修史的依据和参考。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与现在人们采写后又未能被报纸采用的死稿类似，但即使未被刊用，也不能否认它具有新闻的价值和报纸素材的性质。因为《春秋》一书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太简单，其中所含的“微言大义”不经贤人阐发，即使是有学问的人，闭目思之，仍然是“十年

不能解其义”，其他人更往往有记事情节不连贯、时空跨越不衔接、内容交叉少逻辑等感觉，所以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曾“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有人认为王安石本想释春秋，但因考虑到自己的释本不能出已有释本之右，而生“心甚”(即“忌妒心”)，所以才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这是另外的话。

徐中舒先生从内容上分析，认为《春秋》是“朝报邸报”一类的“原始记录”。王安石从政治倾向和形式上把《春秋》称为“断烂朝报”，论述的着眼点固然不尽相同，但用来和《春秋》一书相比拟的，却都是“朝报邸报”或“朝报”，即都是从《春秋》的内容和形式所具有的新闻特征和新闻传播的功能来论述问题的。对这两位大学者在观察、思考、分析《春秋》这一今人认为是历史典籍的著作时所表现出来的共同一致性，恐怕不能仅仅以偶然的巧合来解释的。

4.《春秋》一书记录历史的写法和作者队伍的素质，具有后人所界定的新闻消息和新闻记者的主要特征

首先，《春秋》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强调其可信性（似乎颇接近于现今的新闻真实性）。为了保证所记载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太史——即采访、了解和记录历史事件的文职官员，有时甚至可以“不惜此头”进行抗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崔杼妻棠姜美，在公通焉。夏五月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侍人贾举止众人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自刃于庙。公踰墙，射之，中股，反坠，遂弑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个事例表明，当时的一些太史官是很有点“舍身取义”精神的。为了在《春秋》等史书上记下真实的史事，保证历史的真实，齐太史冒着杀头的危险，在三尺之简上写下了“崔杼弑其君”五个字，果然被崔杼砍掉了脑袋。太史的两个弟弟为了记下真实的史事，保证历史的真实，视死如归，依然直书“崔杼弑其君”，两人毫无疑问地又先后被崔杼所杀死；然而，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然不畏崔杼的淫威，明知直书要砍头，但仍然以史官的责任为重，所记录的还是“崔杼弑其君”五个字。为了

这五个字已经杀了三人的崔杼，被太史及其三个弟弟大义凛然的正气慑服了，知道即使杀了齐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然还会有人把这一事实记在历史上，于是“乃舍之”，齐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才幸免于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史”这个人物，他连姓名也未留下，“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他听到齐太史兄弟四人为了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一史实，全都被崔杼杀死的风传后，为了履行自己史官的责任，明知写了也肯定要被崔杼杀死，但仍“执简以往”，表现出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职业奉献精神。这和当今环境中，一些具有正义感、责任感的新闻记者，为了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不怕压制、不怕打击迫害，甚至不惜牺牲性命的崇高献身精神，有多么的相似。因此，我们认为，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官，不但具有采集、整理、记录新闻消息的职业特点，而且具有当今新闻记者的某些职业道德精神。从这一点讲，当时的史官可以认为已经具有当今新闻记者的某些职业特征。

其次，《春秋》一书对历史事实记录的形式（格式），具有后人归纳、总结、界定的新闻消息构成诸要素的完整性。《春秋》中的一些记载，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当今新闻消息的主要信息要素。朱传誉先生在《新闻的起源》一文中认为：“在形式或编排上，如果我们用新闻学的眼光来看，《春秋》的‘经’，可以说是(新闻的)标题 释经的‘传’，可以说是新闻的本文。‘经’也可以当作新闻的引言（lead)来看。如‘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短短几个字，就包括了新闻引言所应有的时、人、事、地等几项要素”。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们认为是作者（即新闻消息的采写、记录者）为了给读者在第一眼看到这条新闻消息时，就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完整的信息，形成一个轮廓式的完整印象，也为了给读者及后人验证所记载事件的真实可信度提供多方的参照要素。同时，这也是新闻文体写作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我们后人正是在前人大量的新闻作品事实中，总结分析出新闻文体的特征。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其他的诸如“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等经文及释经的传，也大都具有当今新闻消

息文体的多种特征。

再则，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具有当今新闻记者的诸多特征。他们所从事的对史事（有新闻价值的政治社会新闻）的记载，具备了采集、整理、传播新闻的功能，由他们的上述活动形成的《春秋》就自然具有新闻汇编的属性。据文献记载，早在周朝就设有太史、内史、外史、小史等执掌范围各不相同的史官。例如“太史”负责“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内史”则“掌五之八枋之法，以昭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度，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外史”负责“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小史”负责“掌邦国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太史”。“御史”则负责“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

从上述文献记载中规定的各类史官的执掌范围来认识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早在周朝时期的所有重要场合，如军事、朝政、外交、国丧等，都有史官在现场记录。朱传誉先生认为：“周设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各有所掌，类似今天的记者。有的采访军事，有的采访政治，有的采访经济，各有路线。这些史官，不但记中央的事，还记诸侯各国的事。各国的史官，成了中央的驻外记者”。并且还进一步认为：“太史不但记本国的事，也记其他国家的事”。所以，“古代的太史，除了自己随时采访军政要闻之外，并且定期派人出去采访地方新闻，可能还派人去国外采访”。既然周朝的史官就“类似今天的记者”，那么，由“类似今天的记者”的史官采写的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新闻，并按时间编年而形成的《春秋》，应当说也有点“类似”后来的报纸，至少具有古代报纸萌芽的一些属性。

5.《春秋》一书产生社会作用的方式，具有新闻舆论监督的属性特征

《春秋》一书以往一直被人们认为仅仅是史书，而忽视了《春秋》

记载的内容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新闻舆论监督色彩。一般认为，历史典籍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历史记载供后人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知往）；另一方面是通过历史事实中反映的客观规律来预知事情发展的方向（鉴来），一般不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直接而强烈的作用。而《春秋》一书则不完全相同，它除了表现出一般历史典籍所具有的“知往鉴来”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所记载的内容，在当时就发挥了强烈而直接的社会性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并且还引起了部分掌权者的反弹。《春秋》所具有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是通过向社会（或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群）公开某一事实的真相，使制造某些特定事实的社会成员感受到其他社会成员在法律、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环境压力而被逼改其初衷来实现的。例如，董狐记下了“赵盾弑其君”这件事，并且“以示于朝”，这就迅速产生了新闻监督的效应。大概使赵盾感到宫廷的文武百官对自己的鄙视、谴责，于是才来找董狐论理，以企图说服、压服董狐改变说法，并为自己解脱责任。假如不是董狐记下后立即“以示于朝”，赵盾就不会马上知道董狐记载的内容和倾向性，其他文武官员也不可能迅速对赵盾形成舆论压力。如果赵盾没有感觉到舆论的压力，他又为何匆匆地找董狐论理而留下万古笑柄呢？又如“崔杼弑其君”事件，为什么崔杼对齐太史所记的“崔杼弑其君”那么害怕，以杀头来企图胁迫齐太史及三个弟弟为其饰过，就是因为齐太史记的“崔杼弑其君”，也将会迅速“以示于朝”。而一旦“以示于朝”，对崔杼来说则是不仅大失脸面，而且大失人心，所以才有连杀太史及其两个弟弟的暴虐行为。如果《春秋》所记的内容不是马上“以示于朝”，也就不会出现赵盾找董狐论理、崔杼连杀齐太史兄弟三人的事情了。假如太史们所记录的历史事实要等这个国君或掌权的重臣去世后才向社会公开的话，那么对这些国君或重臣而言，史官的记载对他们就无足轻重了，当然也就犯不着因为一条对他目前毫无影响（而且他也不可能知道）的历史记录去杀人、去论理了。为了顾全其面子去论理，为了保持其尊严而不惜杀人灭口，正是《春秋》一书内容在立即“示之于朝”后所表现出来的新闻监督作用的集中体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